

谢继胜 熊文彬 罗文华 廖旻 等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

下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谢继胜 主编

谢继胜 熊文彬 罗文华 廖旻 等著

ཨ་ཁོ་ཤོད་རྒྱུད་ནང་བསྟན་གྱི་སྒྲུ་རྩལ་འཕེལ་རིམ་ལོ་རྒྱུས།

◎ 上海书画出版社

—
下
—

藏传佛教艺术 发展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谢继胜主编;谢继胜,熊文彬,罗文华,廖旻等著.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725-862-9

I. ①藏… II. ①谢… ②熊… ③罗… ④廖…

III. ①喇嘛教—宗教艺术—艺术史—中国 IV. ①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8015号

主 编: 谢继胜

撰 稿: 谢继胜 熊文彬 罗文华 廖 旻

魏 文 奇 洁 李 俊 郭丽平

杨鸿蛟 闫 雪 孙 琳

线图绘制: 郭丽平 王瑞磊 赵 媛 贾维维

图片统筹: 常红红

编辑助理: 常红红 贾维维 尤汪洋 于 硕

石岩刚 郝一川

索引编制: 魏 文 常红红 贾维维

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

责任编辑 周 兵 王 畅

审 读 茅子良

责任校对 郭晓霞

整体设计 姜 明 王红斌 明 婕

技术编辑 杨关麟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8

印张 136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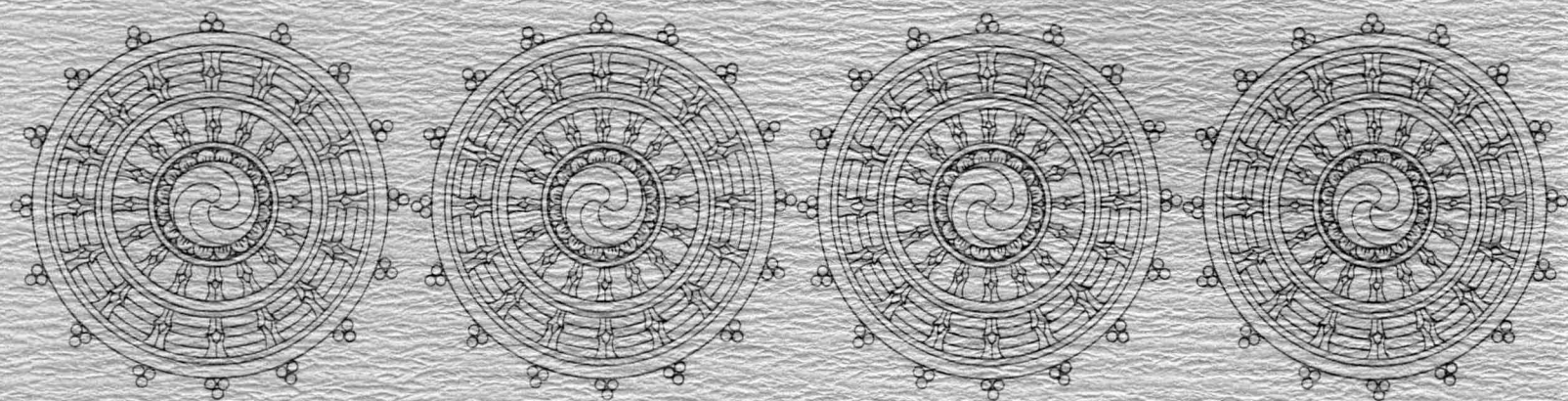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2,300

书号 ISBN 978-7-80725-862-9

定价 1500.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 对汉地艺术的影响



第一节

真觉寺金刚
宝座塔

真觉寺,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西的高粱河北岸,因寺内存有一座金刚宝座塔形制的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整座寺院坐北朝南,前倚高粱河,河临大道,“夹道长杨,绿荫如幕,清流映带”,^①风景极为秀丽,明清之际即已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众多文人墨客曾在此流连忘返,赋诗赞颂。^②现在虽已殿宇无存,原貌尽失,但从伫立在寺院中心宏伟的金刚宝座塔上,仍然可以领略到真觉寺与金刚宝座塔厚重而辉煌的历史。

一、兴建时间与缘起

关于真觉寺和金刚宝座塔的兴建时间学术界说法有三:

一说建于元代。主要依据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须弥座下沿刻有中统三年(1262)八思巴致忽必烈皇帝的新年“吉祥海祝辞”,这种观点认为真觉寺是在元代大护国仁王寺旧址上建立的,而金刚宝座塔的塔基正是大护国仁王寺元初覆钵式喇嘛塔——庆安塔的塔基,其须弥座亦大部分为元代遗构。^③这在明代的《燕都游览志》也可找到佐证。^④但这一说法仍有疑问:一则从地理上来看还有待考证,并不确凿。^⑤二则无论从金刚宝座塔的形制还是雕刻题材来看,都是按照金刚宝座塔的规式和涵义制作的,与元初喇嘛塔相矛盾的:形制上,须弥座(连同整个台基)的横截面呈“□”,这种形制并不见于喇嘛塔底座;雕刻题材上,主要是五方佛的坐骑及其三昧耶形,也与覆钵式喇嘛塔无关联,而是与金刚宝座塔的涵义相吻合的。

一说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据《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永乐年间,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来华,向永乐帝“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于是永乐帝特在北京“西关外”建真觉寺,并命工“创冶金身宝座”。但由于工程浩大,金刚宝座塔在永乐年间并未完成。后于成化九年(1473)又重新加以敕修,金刚宝座塔也终于竣工。^⑥明代于奕正撰写的《帝京景物略》中更加明确地提到永乐帝特为班迪达而建真觉寺,“成祖文皇帝时,西番板的达来送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⑦成化时期礼部尚书姚夔^⑧的一则碑记中的记载也较为一致。^⑨清代的《康熙宛平县志》及此后的大部分文献都沿用此说法。^⑩

①乐善园册,《明》孙国教《燕都游览志》。转引自《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8页。“真觉寺原名正觉寺,乃蒙古人所建。寺后一塔甚高,名金刚宝座。从暗窦中左右入,蜗旋以跻于颠为平台。台上涌小塔五座,内藏如来金身。金刚座左偏又一浮屠,传是宪宗皇帝生葬衣冠处。”另外据明代《帝京景物略》收录的成化御制碑文,曰:“寺址土沃而广,泉流而清,寺外石桥,望去绕绕,长堤高柳,夏绕翠云,秋晚春初,绕金色界。”可知明代真觉寺浑然天成的园林景观。(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0—202页。

②(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0—202页。该书成于明代崇祯年间,书中辑录了明代游客所题真觉寺诗数篇。

③包世轩《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北京文博》2000年第9期。“五塔寺内金刚宝座塔下为长方形石雕须弥座,颇似元初遗构……应为(金刚宝座塔)须弥座间石雕大部是元代旧物,与座上之各类石雕相比较,石质、雕刻技法风格迥然有异,不是同一时期作品。在方形须弥座上最初是一座巨大的喇嘛式塔,是为帝师八思巴而建造的‘大宰堵波’。”

④乐善园册,《明》孙国教《燕都游览志》。转引自《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8页。“真觉寺原名正觉寺,乃蒙古人所建。”

⑤刘之光《元代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位置的商榷》,北京文博网<http://www.bjww.gov.cn/2004/7-27/3057.shtml> 2004-7-27 14:01:10;王世仁《关于元护国仁王寺位置及牛街礼拜寺年代二文的商榷》,《北京文博》2001年第3期。

⑥(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苑囿”,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95—1296页。“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永乐初年,有西域梵僧曰班迪达大国师,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由是择地西关外,建立真觉寺,创冶金身宝座,弗克易就,于兹有年。朕念善果未完,必欲新之。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以石为之,其高数丈,上有五佛,分为五塔,其丈尺规矩与中印度之宝座无以异也。成化癸巳十一月告成立石。”

⑦《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第200—202页。

⑧《明史》卷一七七《列传第六十五·姚夔》。

⑨《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苑囿”。“真觉寺塔规制特奇,寺有姚夔碑记,永乐中国师五明班迪达召见于武英殿,帝与之语悦之,为造寺。”

⑩(清)王养廉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康熙宛平县志》卷一,上海书店,2002年,第39、40页。“真觉寺:明成祖时,西番班的达贡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制,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真觉寺居之。寺准中印度式,累石台五丈,藏级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五塔。”

关于真觉寺的建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建于明代宣德年间,主要源于明代万历释镇澄著的《清凉山志》中“大圆照寺”所记,其中明确提到印度僧室利沙于宣德初年圆寂后,宣德皇帝为其建塔分藏舍利,“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一塔于台山普宁基,建寺曰圆照”。^⑪建塔的残碑仍存于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⑫证明了确有在宣德元年(1426)为室利沙敕建墓塔一事,但是否在宣德年间兴建真觉寺还需进一步证实。在此需提及的是,该塔并非金刚宝座塔,而是位于金刚宝座塔西南侧的一座僧塔。^⑬《补续高僧传》大致与《清凉山志》成书于同一时期,但对室利沙的撰述更加详尽,专列“大善国师传”,详细记录其生平,对其所授僧职和入中土、赴五台山、圆寂等一系列事迹的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⑭更为有据可查,其中记载室利沙于宣德丙午(1426)正月十三日圆寂后,帝命“收舍利于香山乡塔而藏之”,香山乡塔在真觉寺内,^⑮但并未提及为其建真觉寺一事。因此,《清凉山志》关于真觉寺兴建于宣德年间的说法并不充分。

由上可知,关于金刚宝座塔的建立,永乐说的证据则显得更加合理,即兴于永乐,成于成化九年;而真觉寺的建立时间则并不确定,本文亦不作过多讨论。

二、金刚宝座塔和五方佛

由《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可知,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样式主要源自印度梵僧进贡的“金刚宝座之式”,这种塔式即为印度菩提伽耶大塔(Mahabodhi)。菩提伽耶(Bodhgaya)位于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十公里,因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于此菩提树下成道证悟之地而成为八大佛教圣迹之一。最早的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在此为菩提树修建一圈

木质栏杆,这在公元前1世纪的著名巴尔户特佛塔(Bharphut stupa)石栏雕刻上得到了反映。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菩提伽耶寺建于公元2世纪,菩提伽耶大塔则可能是5或7世纪时摩揭陀国王所建的原型,因佛成道时所用台座被称为金刚宝座,^⑯具有金刚不坏之意,因而菩提伽耶塔也称金刚宝座塔。其基本形制为下方承以方形台基,上部为五座佛塔,中央一座大塔,四角各列一小塔。7世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即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菩提伽耶寺,其中的菩提伽耶大塔:

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垒以青砖涂以石灰。层龕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或连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铜阿摩洛迦果(亦谓宝瓶又称宝台)。东面接为重阁,檐宇特起三层,椽柱栋梁户扉寮牖,金银雕镂以饰之,珠玉厕错以填之。奥室邃宇洞户三重。外门左右各有龕室,左则观自在菩萨像,右则慈氏菩萨像,白银铸成。高十余尺。^⑰

从中能够获悉当时菩提伽耶塔的建造规模、材质、形制等基本资料,如塔壁上有多层佛龕、宝瓶式塔顶、东面建筑为重檐等等,这些为研究金刚宝座塔提供了佐证。该塔于此后历经损毁和重建,其中缅甸国王曾于11世纪末和13世纪末出资维修过两次。^⑱19世纪70年代,缅甸佛教徒在当时孟加拉国政府的协助下,也对其进行过修复,1881年印度考古调查队再次对其整修,这也是至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

由于菩提伽耶塔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为一种对佛成道圣地的敬仰,大量菩提伽耶塔及其寺院的模型应运而生,至少可以追溯至11世纪末,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材质多样,主要见于木

⑪(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二“伽蓝胜概”,中国书店,1989年,第37页。“永乐初,印度僧室利沙者来此土,诏入大善殿,坐论称旨,封圆觉妙应辅国光范大善国师,赐金印,旌幢遣送台山,寓显通寺。至宣德初,复诏入京,广宣秘密。无何,辞归山,尚未许。明日示寂,上闻,痛悼之。御祭火化,敕分舍利为二。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一塔于台山普宁基,建寺曰圆照。”

⑫1993年出土于五塔寺的“领占之塔”塔碑。此碑出土于金刚宝座塔西南侧原真觉寺塔院处,已断残,横书汉文“大(明)敕建”,右侧竖书汉文一行“领占之塔”,碑正中横书藏文七行,汉译:“大明宣德年秋月吉日,敕建此塔,僧录司玉铎桥班丹领占(音译右阐教仁钦)灵塔……宣德元年……”左侧竖书汉文一行:“宣德元年庚子(本著作注:应为庚寅)月己亥日。”梵文班丹发音为室利。所以从内容上看,“领占之塔”应为室利沙所建。参见五塔寺展览图录。

⑬周肇祥著,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卷二。“……寺西僧塔三,大者无碍,制特宏丽。疑即板的达藏骨处。”

⑭(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五“大善国师传”,商务印书馆,1923—1925年。“实哩沙哩卜得昧,东印土撈葛麻国王之第二子也。……称为五明板的达……永乐甲午年(1414)入中国,谒文皇帝于奉天殿,应对称旨,命居海印寺。丁酉(1417)奉命游清凉山。还都,召见武英殿,天语温慰,宠赉隆厚。授僧录阐教,命居能仁寺。岁甲辰(1424)仁宗昭皇帝举荐扬大典,师掌行,特授师号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弘教灌顶大善大国师,赐金印宝冠供具仪仗。乙巳(1425)宣宗章皇帝举荐,亦命师掌行……(实哩沙哩卜得昧)俨然而寂。实宣德丙午(1426)正月十三日也。讣闻,上悼叹之,命有司具葬仪,闍维,收舍利于香山乡塔而藏之,遗命分藏清凉山圆照寺,亦建塔焉。”

⑮据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大明御用监大监钱公墓志铭》记:“公尝奉敕建真觉寺于都城西香山乡。”可知香山乡塔应在真觉寺内。

⑯(唐)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故曰金刚座焉。”

⑰同上注。

⑱Ulrich Von Schroeder: 2001.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I, p. 321.

质、石质和金属质地。制作工艺上,也有整体雕刻和成批的零件组装之分;^①地域上分布也十分广泛,不仅见于印度、西藏等地,即便在遥远的明代内地宫廷也见有收藏和制作。至今西藏纳塘寺(sNar thang)还保存有一组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木、石雕菩提伽耶塔模型,^②颇为珍贵。关于艺术风格,宿白^③和海瑟·噶尔美^④两位学者均认为它属于纯印度作品,然而根据Ulrich Von Schroeder先生对菩提伽耶塔模型的研究,认为此塔已经掺杂了中国的装饰元素,属于11世纪末以后的作品。^⑤由于无缘亲见,所以暂且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无论产自何地,这组作品对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少在时代上,它与永乐年间印度梵僧所贡模型是具有交集性质的。模型本身即透露出诸多信息:一是明确了菩提伽耶塔的朝向为东方,这一点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二是从遍布在菩提伽耶塔身的图像上看,主要为佛证道和佛传题材,并未体现五方佛的思想体系;三是塔室内部空间呈狭长的长方形,并非中心柱式。这些均是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相区别而应特别予以关注的地方。

金刚宝座塔的图像在我国流传较早,早在北周时期(557—581)敦煌莫高窟第428窟的壁画中,即已出现高台上置五塔的塔式;但作为建筑样式,则传入中国较晚。这种形制在我国现存有近十座,山西五台山圆照寺喇嘛塔(1434)、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塔(1458)、湖北襄樊广德寺多宝如来塔(1494—1496)、内蒙古

呼和浩特慈灯寺塔(1727—1737)、北京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1748)、北京玉泉山妙高塔(1736—1795)、北京西黄寺清净化城金刚宝座塔(1782),大多修建在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之后,五塔的风格并未完全依照菩提伽耶塔,而更多融合了自身创造,有覆钵式喇嘛塔,也有密檐式汉塔。

五方佛思想是密教金刚乘的根本宇宙观,其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佛教神系的完备和系统化。五方佛体系形成于7—8世纪,伴随《大日经》、《初会金刚顶经》等经典的出现而最终完成。五方佛又称五佛、五智、五智如来、五禅定佛,有金刚界和胎藏界之分。金刚界五方佛,包括大日如来(Vairocana)、阿閼如来(Aksobhya)、宝生如来(Ratnasambhava)、无量寿如来(Amitabha)、不空成就如来(Amoghassiddhi);胎藏界五方佛则有大日、宝幢、开敷华王、无量寿、天鼓雷音。藏传佛教密教中,主要以金刚界五方佛为中心。^⑥

五方佛思想与金刚宝座塔的结合,据谢继胜教授认为,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即已出现实例,《贤者喜宴》和传为阿底峡发掘的伏藏《柱间史》中即多处记载五个顶宝塔和五尖塔(mchod rten rtse lnga),应为金刚宝座塔式;《柱间史》中还明确提到松赞干布曾填湖修建五个顶宝塔以安置五方佛与五佛母。^⑦这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五佛分为五塔”的布局思想如出一辙,永乐年间西梵班迪达将金佛五躯与金刚宝座塔之式一同供入宫廷,也体现了对金刚宝座塔同样的理解。

^①Ulrich Von Schroeder: 2001.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I, p. 322.

^②其中,在纳塘寺即存有两组,一组为石质,一组为木质。罗睺罗(Rahula Sankrityayana)在1936年曾对其进行拍照和文字记录,其中记载:“1934年9月13日到奈塘寺……(寺)有一套十二世纪的佛陀伽耶大菩提寺的石制模型,那是用佛陀伽耶地方的黑色石料雕刻的。在模型中,除了主殿以外,还有许多小型佛殿,很多塔,一部分雄迦(Sunga)王朝式的栏杆,全寺围墙和三座大门;不幸那块用来安置全部建筑物,排定各建筑物的位置的木板丢掉了。因此,除了主殿和三座大门(上面刻有藏文字)的位置而外,其他建筑物的位置,我们无法知道了。由于年代久远,这套模型保存得不太好。另有一套木制的模型,那是仿照石制模型而制成的。这木制模型却保存得很好,可是这套模型原来做的木板也丢了。我们由这套模型可以看到,大菩提寺有三座大门,正门是在东面,北面有一座门,南面有一座门,主殿的东面也有三个门,两边的两个门常关着不走,只有中间一个门出入通行。在主殿的西面也有一个门,却也是关着,不能由这个门进到殿里去。上一次(1929年)我来西藏的时候,我曾经发现就由这个奈塘寺到印度去的一位卓工采译经师(1153年生)写的一本旅途日记,当伊斯兰教军队冒犯并摧毁大菩提寺的佛教和殿堂的时候,那位大译师正在佛陀伽耶,他是一个亲眼看到这种摧毁行动的人。在他的笔记里,他叙述过大菩提寺围墙内外的许多建筑物的位置。我想这套石制的模型,就是写那本日记的那位译经师带到西藏去的。”Sankrityayana, R. 1937. “Second Search of Sanskrit Palm-Leaf Mss. in Tibet”,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Vol. XXIII, Part 1, pp. 1—57, [2 illustrations of the models of the Mahabodhi Temple at Narthang monastery]. [印]罗睺罗著,王森译《再到西藏寻访梵文贝叶写经》,《现代佛学》1951年第4期。转引自宿白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4—125页。

^③然而据《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之《西藏日喀则纳塘寺调查记》记载,1959年对其进行调查时,在度母堂发现有“大明永乐年施”刻铭的木石雕印度菩提伽耶寺院模型一组,但与罗睺罗所记有差,此模型为木石两种制品混合的,有底板(绘有平面示意图),在主要的石质寺门模型上发现有“大明永乐年施”的细线刻文,因此罗睺罗“上面刻有藏文字”的判断有误。因为此组模型应为15世纪初由明廷贡施此寺的。这组模型主要存有寺门、塔、殿等个体共二十一件和附有角楼的方形围墙一匝,其中最大佛殿和寺门顶部皆具五塔(中间大塔四隅各一小塔),其余殿堂门顶部亦皆高耸作塔状,雕镂精细,形制、工艺纯属印度风格,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不同,推断此组模型来自天然,永乐年施款当是模型抵中国后所补雕。”宿白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④《文物》1960年第8期,第60页。据该系列文章第七篇第55页记载,考古队还意外地发现了与这组作品相通、铸有相同题记的另外一些模型,据海瑟·噶尔美推测,出土地点至少是14世纪建筑。转引自[法]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57—158页。《西藏佛教艺术》图版11。规格60×52厘米。

^⑤Ulrich Von Schroeder: 2001.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I, p. 327, figs. IV—4&5.

^⑥杨清凡《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⑦Devi steng du rgyal po chen po srong btsan sgam pos mchos rten rtse lnga pa cig bzhengs/devi nang du rin po che sna lnga la rang byon du grub pavi rgyal ba rigs lnga yab yum beu bzhugs/(bkav'chems ka khol ma《柱间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据谢继胜教授考证, mchod rten rtse lnga 与五台山(ri bo rtse lnga)的藏语构词方式一致,因此可以翻译成“具有五个尖顶的一座塔”,显然为金刚宝座塔的样子。

三、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与菩提伽耶寺相仿,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同样坐落于寺院的中央位置,为四周殿宇建筑所围绕,向前可以俯瞰前大殿、天王殿、山门直至牌楼,向后则回望中大殿与后照殿,左右两侧又夹以行宫和宪宗皇帝生葬衣冠塔,呈现出众星捧月之势。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局充分体现了永乐帝为塔建寺的初衷,突出了金刚宝座塔在真觉寺中的重要地位,在内地寺庙中也是独树一帜。^{②6}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为砖、石结构,内砌灰砖,外筑汉白玉,其形制基本参照了菩提伽耶塔的样式,下部承以高台,上部分布五座佛塔和一座罩亭,基台在横截面上呈“□”,即在南2.1米处有一近30厘米的收腰,这与菩提伽耶塔也是形制一致,只是内收程度略浅,其用意在于划分基台的内部空间。建筑全高约1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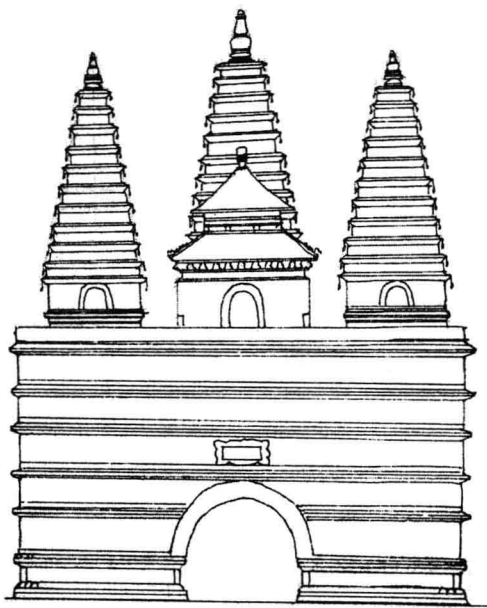


图1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线描图

台基南北长18.6米,东西宽15.73米,宝座与其上中塔的高度比例接近1:1,五塔高度也较相近,因此该塔整体给人以庄重秀丽的感觉,而不同于菩提伽耶塔的高耸峻峭之感(彩图5m-1-1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正面)、(图1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线描图)。

1. 宝座部分

金刚宝座塔下部的高台,即宝座部分,高约7.7米,其下承以50厘米的台基。宝座分为须弥座和塔身两部分,须弥座高约1.8米,由下至上分别为圭角、下枋、下枰、束腰、上枰、上枋六个部分。圭角为典型的明代云纹装饰,边角圆润。下枋阳刻一周兰札体梵文,若干字一组,每组之间以十字交杵间隔。上枰和下枰出挑较深,各雕一圈八达玛,即藏式仰、覆莲瓣,莲瓣肥厚,纹饰富丽典雅,为15世纪较流行的莲瓣样式;其中下枰的皮条线上还刻有一周藏文,据黄颢先生考证,藏文内容是元中统三年(1262)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祝辞——《吉祥海祝辞》,^{②7}文字中间装饰三股金刚杵纹和菱形纹饰。上枰的皮条线则主要为独股和三股金刚杵纹饰,金刚宝座塔中出现的金刚杵^{②8}无疑寓意护持宝塔、驱除外道邪魔的作用,与曼荼罗(mandala)中的外沿一圈金刚杵功用相同。

须弥座中间的束腰部分较深,比例较大,约占须弥座整体的三分之一,雕刻题材主要为金刚界五方佛的坐骑及其三昧耶形、四大天王及降龙、伏虎罗汉等,以金刚杵代替了须弥座常见的石柱来作为分割元素。这些形象均以减地平钹法^{②9}雕刻而出,手法细腻,形象逼真,宛若天成。束腰上五方佛的坐骑的分布,规律十分明显,主要按照密教瑜伽部中五方佛的方位排列在南西北东四面上。7世纪末密教瑜伽部的经典《初会金刚顶经》

^{②6} 罗哲文《五塔寺》,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2页。

^{②7} 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共计四十四句,全文:“对此吉祥大海之佛宝,以大海般笃信之心予以顶礼,则众生所获吉祥如同大海。兹赞颂吉祥大海之辞:富足大海系功德宝库,佛法大海可汇集为智慧,善业可聚合成成就大海,吉祥之海赐当今吉祥!两善出自德业之海,智慧大海深广无涯,诸行遍通畅达如海,吉祥之海可赐当今吉祥!佛经大海有正悟,宝海宝藏为所依,佛法大海诸善业,吉祥之海赐吉祥!欲望大海戒根坚,功德大海民生善,僧伽大海诸善业,吉祥之海赐吉祥!佛像如海永长存,福德之海大而广,佛法大海极辽阔,善于亲近智慧海,听闻大海如宝饰,智海宝幢谓吉祥,吉祥大海□胜利。此为吉祥大海颂,此辞赞颂彼大海。明智大海动人心,亦谓诗词之大海。殊胜当以佛为最,太阳法主佛加持。因此平息灾祸语,吉祥常在获吉祥!法性□□最崇高,佛法甘露真赐福,福慧资粮可宏扬,吉祥常在获吉祥!佛子造益真赐福,平息愚苦烦恼敌,吉祥常在获吉祥!为使皇帝社稷安,祈愿一切皆吉祥!”萨迦寺也存有相同内容的文本,但较此段少四句。

^{②8} 金刚杵(vajra)原为古印度兵器,象征如来金刚之智慧大用,能破除愚痴妄想之内魔与外道诸魔障碍,形状有独股、二股、三股、四股、五股、九股、宝杵等,而以独股、三股、五股最为常见。独股和三股金刚杵各自象征“独一法界——一真法界”和“身、口、意”三密平等,用途分别为行道念诵和加持神用,独股杵还用于修“佛部和莲华部”法。据李树琦、释祥云编著《佛教器物简述》,参见《佛学电子辞典》“金刚杵”。

^{②9} 《营造法式石作制度》:“其雕镂制度有四等:一曰剔地起突;二曰压地隐起华;三曰减地平钹;四曰素平。如减地平钹,磨砻毕,先用墨蜡,后描华文钹造。若压地隐起及剔地起突,造毕并用翎羽刷细砂刷之,令华文之内石色青润。”《营造法式》卷二,转引自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Tattvasamgraha)中最早对以大日如来为中尊的五方佛及各自身色、真言、印契、曼荼罗做出规定,无上瑜伽部密教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Guhyasamaja)对其各自明妃进行了明确,其后又逐渐融入五蕴、五智、五大等思想。20 世纪上半叶印度学者 B. Bhattacharyya 对五方佛体系进行了整理,详见下表:^③

尊名	毗卢遮那佛	阿閼佛	宝生佛	阿弥陀佛	不空成就佛
方位	中央	东	南	西	北
部族	佛	金刚	宝	莲花	羯磨
身色	白	青(蓝)	黄(金)	红	绿
三昧耶形	法轮 (或佛塔)	金刚杵	宝珠	莲花	羯磨杵
印相	智拳或 转法轮印	触地印	与愿印	禅定印	无畏印
台座	狮子	象	马	孔雀	金翅鸟
种子字	OM	HUM	TRAM	HRIH	KHAM
五蕴	色	识	受	想	行
五大	空	风	地	火	水
五识	眼	耳	鼻	舌	身
五境	色	声	香	味	触
五智	法界体 性智	大圆镜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	成作所智
明妃	金刚界 自在母	佛眼佛母	嘛玛基 佛母	白衣佛母	度母
五方菩萨	普贤菩萨	金刚手 菩萨	宝手菩萨	观音菩萨	交杵金刚 手菩萨
世间佛	拘留孙佛	拘那含 牟尼佛	迦叶佛	释迦牟尼佛	弥勒佛

五方佛图像在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具体表现上,不同于一般世俗对于方位的理解,而是依据曼荼罗中四方的概念,即塔的

正面即南方,对应的是五方佛中东方的阿閼佛,依此类推:西面对应南方宝生佛,北面对应西方阿弥陀佛,东面自然就是北方不空成就佛,大日如来居于中央,在图像表现上则与东方阿閼佛和西方阿弥陀佛同时出现。^④

五方佛的坐骑和三昧耶形同样按照这一次序相应分布于四面,如下表:

具体方位	南	西	北	东
代表佛	阿閼佛 (大日如来)	宝生佛	阿弥陀佛 (大日如来)	不空成就佛
图像 (由左至右)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象	宝瓶莲花	法轮	宝瓶莲花
	法轮	摩尼宝珠	孔雀	摩尼宝珠
	狮子	金刚杵	狮子	金刚杵
	券门	马	券门	金翅鸟
		法轮		法轮
		马		金翅鸟
	狮子	金刚杵	狮子	金刚杵
	法轮	摩尼宝珠	孔雀	摩尼宝珠
	象	宝瓶莲花	法轮	宝瓶莲花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羯磨杵

从中可以总结出三个规律:一是在每一面束腰的两端都饰有一个羯磨杵,羯磨杵在此出现,已不单纯是作为能够代表不空成就佛的三昧耶形,而更多地是体现了对曼荼罗的护持功能,因为在佛教仪轨中,羯磨杵象征绝对的定力,具有摧破十二因缘之力,通常被安置在修法大坛的四角,成为曼荼罗不可撼动的支撑物和地基。^⑤二是五方佛的三昧耶形排布规律虽不明显,主要集中在东西两侧,但却比较完整,仍能够与五方佛一一对应,实为难得。三是对大日如来的强调。作为中尊的大日如来一直贯穿于束腰的四面,或以三昧耶法轮的形式出现于东西两面的中

^③ 故宫博物院编《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第 44 页。依据《印度佛教图像志——基于〈成就法鬘〉及其相关密教仪轨文献》(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Based on the Sadhanamala and other Com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Calcutta; 1924)。

^④ 分析这种方位分布的缘由,与其依循的菩提伽耶塔的朝向也不无关联,因为菩提伽耶塔的正面也恰为东方。

^⑤ 羯磨杵(梵文 Karma-vajra)密教法器,由三钴杵交叉组合成十字形,象征诸佛本具之作业智,属于轮宝。又称羯磨金刚、十字羯磨、十字金刚、轮羯磨,或单称羯磨。修法时,大坛之四隅各置一羯磨金刚,以象征摧破十二因缘之义。此外,亦有以莲花形羯磨台置于大坛四隅者,《一字佛顶轮王经》中说:“其四角隅,各画二金刚杵,十字交叉,如是印等莲华台上如法画之。”据李树琦、释祥云编著《佛教器物简述》,参见《佛学电子辞典》“金刚杵”。[英]罗伯特·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02 页。

心位置,或以法轮与坐骑狮子结合的形式排列在南北券门两侧,很明显地反映了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密教瑜伽部思想。

在东西两面近于南端的束腰部分,也即相当于过室部分,还雕刻有四大天王,西面为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东面为持国天王和增长天王。各天王头戴五佛宝冠,身穿甲冑,武士装扮,披帛飘举,手持各种武器,垂足坐于莲座之上。之所以采用这种坐姿而非汉地常见天王的站姿,主要是为了适应束腰部分扁宽的形式。在收腰处,东西各雕有汉地佛教中常见的降龙和伏虎罗汉,西面的伏虎罗汉人物刻画极为生动传神,背景还采用了汉地绘画中习见的枯石兰草题材,具有极强的汉地艺术风格。收腰部分将基台的内部空间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过室,外壁装饰以四大天王与降龙、伏虎罗汉,类似于汉地寺院中天王殿和护法殿的功能;后部分为供奉佛像的中心柱式塔室,也即相当于佛堂,有力地证明了金刚宝座塔是一座塔庙结合的建筑,这也是金刚宝座塔传入中国后,与汉地佛寺建筑相融合的表现。此外,在南北券门两侧还刻有莲托八吉祥纹饰,每两个宝物上下为一组,共四组,分置在四面侧壁上,纹饰雕刻极为繁密细致,延续了永乐时期莲托八吉祥纹饰的时代特征(彩图 5m-1-2 金刚宝座券门两侧莲托八吉祥纹饰)。

须弥座以上的塔身部分共有五层,每层之间“以檐为界”“龕列佛像”。檐头仿自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椽子、沟头、滴水清晰可见,这种“以檐为界”的柱龕形式,早在6世纪云冈石窟中即已出现。每层檐下刻若干佛龕,十二个至二十个不等,每龕龕顶置有华盖,之间列宝柱,柱子为14、15世纪的西藏和内地藏传佛教唐卡及壁画中尤为流行的宝瓶卷草式,形制主要因袭印度建筑柱子样式,柱下为宝瓶,柱身由上至下逐渐收缩,缠绕卷草,其中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建筑元素,在柱上刻出一斗三升的斗拱结构,与上部的汉式短檐融为一体。在每层佛龕的下部都刻有一

周圭形的岩山,即铁围山,岩山错落排布,可辨认出内外共三重,据5世纪的《阿毗达磨俱舍论》,整个宇宙都被包围在铁围山中,在塔上多出现在塔基一周,明代佛塔中较为常见。

塔身的四面佛龕共有三百七十八个,每龕各置一佛,均为五方佛题材。这些佛像的排布规律十分清晰,大致按照纵向基本保持不变、横向以五方佛的顺序依次排列,但也有十余处排列并不规则,有的甚至已经遗失,或在材质上也有异于其他佛龕,^③明显是经过后人补修或调换的。览诸真觉寺历代重修记录,推测这些错位或调换痕迹极有可能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和二十六年(1761)对真觉寺的两次敕修时所为。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帝为给母崇庆皇太后祝寿,曾先后对真觉寺进行两次敕修,尤以后一次规模最大、耗资最多,^④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奏案》中还明确提及“成造粘修……金刚宝座塔台一座,宝塔五座,重檐亭一座”。^⑤此后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至二十七年(1938),北平政府也对其进行修缮,但据“正觉寺金刚宝座修缮工程碑”记载,其修缮仅包括增修院墙、门楼、两侧门房以及收回地基,并未涉及金刚宝座塔的修补。^⑥

每一佛龕与龕内佛像的石板并非整体雕刻的,而是分体制作,然后拼在一起的,说明这些佛像有批量制作的性质。佛龕造像的特征明显,每尊佛像除手印有所区别外,其他特征基本相同。龕沿均呈连弧尖拱形,并饰有七珍纹样,中间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肉髻螺发,面目方广,五官开阔,眉眼之间略带微笑,袒右袈裟,背光呈桃尖形或舟形,背龕肩部有类似于飘带的装饰。在雕刻手法上,同样采用减地平钹法,但相较于须弥座上的动物和植物等题材,其雕刻水平稍逊一筹,阳刻表面的阴刻线略显繁琐,衣纹刻法过于程式,对人体的表现也并不精到,头大

^③值得提出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磊同学在2007年专门对塔身的每一尊佛像都进行了仔细的辨认和记录,将调查结果收入其硕士论文《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形制与造像研究》。

^④据“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内务府奏本”,乾隆十六年准销即已达到“银八千九百八十五两一钱三分”,转引自向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第87—92页。乾隆二十六年工程费用竟是其五倍多,达“四万七千五百一十五两三钱”(未计所使用的“旧料抵用银一万四百八十二两五钱”)。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奏案》第七件。

^⑤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奏案》第七件。“正觉寺改建天王殿五间,东西配殿十间,转角房十六间,顺山房六间,添盖重檐琉璃碑亭二座,穿堂一间,门罩三间,大殿后添砌大墙一道,长二十丈六尺,高二丈五尺,厚五尺,两旁添砌院墙,奏长十一丈四尺,高一丈八尺,厚三尺,安青砂石土衬,墙身下肩用细新样城砖灰砌,上身旧样城砖糙砌,抹饰红灰。墙顶瓦二号筒板瓦,成造粘修山门三间,钟鼓楼二座,大殿五间,金刚宝座塔台一座,宝塔五座,重檐亭一座,毗卢殿五间,后殿五间,两山转角房五十二间,东西两所房四十六间,僧房十间,牌楼一座,旗杆二座,院墙奏长三百三十丈以及折漫甬路,海漫散水外檐,油饰彩画,裱糊粘补佛像见新并山门、天王殿、大殿、碑亭改瓦黄色琉璃瓦料等项工程,约需物料工价银五万七千九百九十七两八钱,内除旧料抵用银一万四百八十二两五钱,净需物料工价银四万七千五百一十五两三钱,又勘得高亮桥挪用。”

^⑥参见“正觉寺金刚宝座修缮工程碑”拓片:“五塔寺金刚宝座修缮工程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开工,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完工,立于塔之四周,收回旧基地三十亩,添筑门楼院墙以资维护。”民国时期政府对真觉寺的保护措施主要见于几则政府颁发的训令:1934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北平市政府转发古物保管委员会关于严缉盗窃西郊五塔寺塔顶匪徒并妥善保护办法的训令。1938年12月1日—1939年5月28日:(伪)北京市公署关于接收、保管五塔寺的训令、指令及坛庙事务所报送的接收、保管办法,清册、略图。现藏于北京市档案馆。

身小,尤其对双耳的表现略显笨拙(彩图 5m-1-3 金刚宝座佛龕佛像)。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制作工匠的来源和水平有所不同。

值得提及的是,在每一佛龕的两侧均镌刻有供养人的题记。由于自然风蚀以及人为破坏,大部分题记已经损毁或漫漶不清,能够辨认的只有几则,弥足珍贵。这些题记主要以“……施财造”的形式出现,供养人的身份主要为供职于御用监、供用库、浣衣局一类皇宫内廷的信官,职位较低微,如“御用监□□董父香施财造”、“浣衣局信官黎宝施财造”、“供用库信官毛彬施财造”。^{③⑦}但其中也有僧人,如“西天经厂信士北九巨力施财造”、“……塔室利施财造”,两则位置极为接近。^{③⑧}从题记姓名来看,为印度梵文的音译,加之前一题出现明代三大经厂之一的西天经厂,因而可以判断两人身份应是西天僧无疑,这与成化年间真觉寺住有西天僧的史实是相符合的。^{③⑨}据考证,永乐年间贡奉金刚宝座塔式的西域梵僧即是一位西天僧,其名为“室利沙”,圆寂后,其舍利即葬于真觉寺内,法脉也以真觉寺为基继续弘传。本节将在最后部分,对进贡金刚宝座塔之式的西天梵僧进行论述。

宝座的南北正中各辟一六拏具券门(彩图 5m-1-4 金刚宝座券门六拏具),高度约占宝座高度一半,南面门券上方嵌有铭刻“敕建金刚宝座大明成化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造”的长方形匾额。门券上的六拏具由上至下左右对称排布,分别为金翅鸟、龙女、摩羯鱼、带翼狮羊、狮子和象,其中摩羯鱼、狮羊、狮子和象,每一形象均下承莲座,周边布满卷草图案,雕刻细腻,手法圆润,与须弥座下的雕刻工艺相得益彰。六拏具原为一种背龕样式,主要由金翅鸟、龙女、摩羯鱼、童子、独角兽、象六种形象构成,具有六度之义;在图像上,各形象并不固定,至 18 世纪趋于稳定,工布查布翻译的《造像量度经解》中对其作了专门的解释。^{④⑩}六拏具传至内地后,由背龕延伸到门券的装饰上,最早在元代居庸关过街塔上出现,真觉寺即是延续这一传统,但在图像上有所不

同,以狮子代替了童子的形象,风格上,也更趋恬淡典雅,少了许多元代藏传佛教造像的猛力之风。六拏具两肩上还饰有中国传统吉祥图龙凤纹,南面为云龙纹,北面为云凤纹,有机地将汉藏两种文化和艺术融为一体。

宝座内部空间可以分为前面过室和中心塔室两部分,整体呈“凸”字形,过室天顶有一盘龙藻井,象征金刚宝座塔皇家敕建的地位,两侧各设有券门,通向上层台座的四十四级旋梯。塔室与菩提伽耶塔长方形塔室不同,中心立有四面开龕的中心柱,每龕各置一佛,南面为释迦牟尼佛,其上为檐龕,西面为阿弥陀佛,北面为燃灯佛,东面为药师佛,其中除北面的燃灯佛为十世班禅所敬献的铜像,其余三面佛像均为建寺之初的石雕像。在图像上,巧妙地将纵横三世佛组合在一起,合理地利用了塔室空间。这种中心柱式由印度的支提窟演变而来,最早出现在 4 世纪的龟兹地区,主要用于礼佛。缘梯而上,两侧旋梯各有两处转角,第一处转角顶部为盘龙藻井,第二处即接近台座之处则各有一阳刻法曼荼罗,两方曼荼罗均为八瓣莲花式圆形构图,四角各置四大天王种子字,每一莲瓣内有一兰札体梵文,东侧为五方佛及其佛母曼荼罗,可与金刚宝座塔的义理相应(彩图 5m-1-5 金刚宝座塔东侧旋梯藻井曼荼罗),西侧为一圈某一尊神的梵文咒语,未能辨认(图 2 金刚宝座塔西侧旋梯藻井曼荼罗线描图)。登旋梯出,最先抵达的是方形重檐琉璃罩亭,该亭为典型的汉地建筑样式,其琉璃瓦经乾隆二十六年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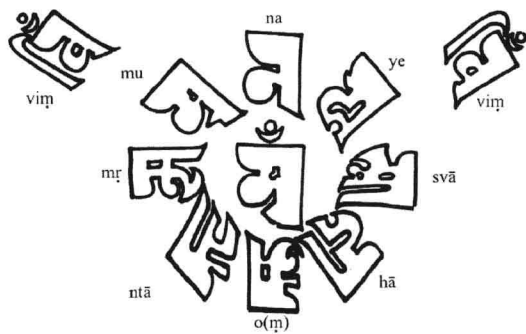


图 2
金刚宝座塔西侧旋梯藻井曼荼罗线描图

③⑦三条题记分别位于西面最下一行南端第十二列、第七列以及东面最下一行北端第四列的佛龕右侧边沿上。

③⑧两则题记均位于东面最下一行,前一题位南端第十列,后一题位南端第八列。

③⑨“成化二十年,太監覃昌传奉圣旨,升该寺僧人讲经答儿麻悉提为国师、刺麻麻尼星曷及纳悉提为都纲。三僧名式都具印度色彩,当为实哩沙徒裔。《武宗实录》卷六五,正德五年七月己卯条又载升真觉寺僧牟尼星曷为右觉义。麻尼星曷应即牟尼星曷之异写。”参见杜常顺博士论文《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第 121—122 页。又见杜常顺《明代“西天僧”考略》,《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23—33 页。

④⑩《佛说造像量度经解》卷一,《大正藏》第二十一册,第 945 页。“有云六拏具者:一曰伽噌拏,华云大鹏,乃慈悲之相也(鹏鸟与慈悲,梵名相近,故借其音而因以有形,表示无形之义,余皆仿此);二曰布啰拏,华云鲸鱼,保护之相也;三曰那啰拏,华云龙子,救度之相也;四曰婆啰拏,华云童男,福资之相也;五曰舍啰拏,华云兽王,自在之相也;六曰救啰拏,华云象王,善师之相也。是六件之尾语,俱是拏字,故曰六拏具,又以合为六度之义。”

2. 五座小塔

台座之上安置五座重檐宝塔,一大四小,大塔立于中央,四小塔分置四角。五塔均为四方密檐式塔(图3 金刚宝座塔五座小塔俯视图),均下承须弥座,中部四面开龕,上坐密檐,在高度上相差不多,中塔高约8米,上檐十三层,与菩提伽耶塔模型一致;四塔高约7米,密檐十一层。虽文献记载五塔分置五佛,但在图像分布上,五塔基本一致,并未体现五方佛的具体方位,而更多地透露出佛成道证悟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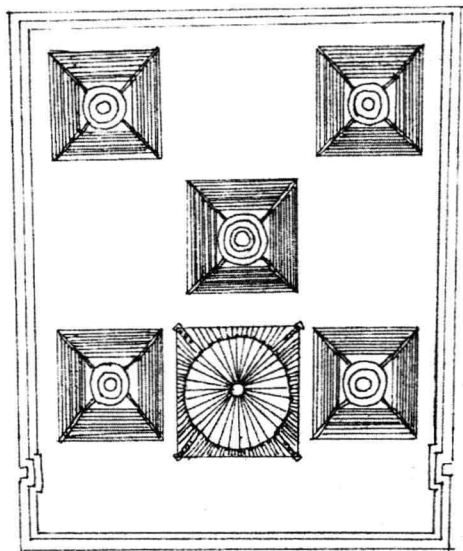


图3
金刚宝座塔五座小塔俯视图

五塔须弥座的样式、表现手法与基台须弥座一致,只是在束腰处,表现五方佛的三昧耶形明显减少,但五佛坐骑仍按照各自的方位保留下来。四角小塔须弥座的图像完全相同,均为:

具体方位	南	西	北	东
代表佛	阿閼佛 (大日如来)	宝生佛	阿弥陀佛 (大日如来)	不空 成就佛
图像 (由左至右)	象	宝瓶莲花	孔雀	宝瓶莲花
	狮子	马	狮子	金翅鸟
	摩尼宝珠	羯磨杵	法轮	法轮
	狮子	马	狮子	金翅鸟
	象	宝瓶莲花	孔雀	宝瓶莲花

显然,这里并未将五方佛的三昧耶形与其一一对应,只是对

莲花较为强调。中央大塔的西、北、东三面均与此一致,只是南面,即正对罩亭出口的一面稍有差异,未出现狮子和摩尼宝珠,而是以佛足和缠枝莲托八吉祥替代,旨在向朝圣的教徒示意佛的圣迹在此。佛足代表释迦牟尼佛的足迹遍布四方,寓意佛教的威力广被,作为瑞相的八吉祥与佛足图像的组合作在早期佛教艺术中即已出现。不同于宝座,每座小塔须弥座的上枋处均有一圈兰札体梵文。

五座小塔的中部为佛龕部分,在图像上,每塔四面均为同一种题材,即中间一龕,两旁各置一菩萨、一菩提树。龕内为触地印释迦牟尼佛,表现佛成道证悟之像,图像风格与塔室内造像一致,释迦牟尼佛着右袒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之上,左手作禅定印,右手触地,马蹄形头光,虽仍头大身小,但五官与肢体表现得十分圆润、饱满,并不显得笨拙,宁静中蓄积着力量。佛龕上刻六拏具形象,其造型亦与宝座券门如出一辙。佛龕两旁的胁侍菩萨为明显的印度艺术风格,火焰式背光,发髻高耸,头戴宝冠,宝缯上举,眉弓呈圆弧形,双目微含,嘴角上翘,面部体现了内地佛像造像特征,圆形耳珰垂于两肩,上身裸露,小腹圆鼓,身披璎珞,双手当胸作妙供养印,披帛搭于两臂自然下垂,下身衣着为丝绸质感的汉地服饰,恬静地立于莲座之上,臂钏、腕饰、踝饰一应俱全。左右两棵菩提树,寓意佛于菩提树下成道之意,树间饰摩尼宝珠等物。这些雕刻的表面显现有斑斑的红色凝结物,应为“血料”,即在该塔完工时,用猪血和上腻子与面粉加糯米汁调匀,再刷于塔身上,多次贴麻布刷大漆,用以保护石料,不过现在已经剥落殆尽(彩图5m-1-6 金刚宝座塔小塔佛龕及浮雕)。

佛塔上部为密檐层龕,龕内为五方佛题材,佛龕数量由下至上逐层减少,每层密檐四角均挂有铜铃。塔顶置有铜质覆钵塔式塔刹,覆钵上有梵文经咒,但已风化难以辨认。

台座外缘围绕一圈圭形岩山,岩山高66厘米,厚12厘米,寓意明显,将整个台座视为宇宙,一大四小的五塔视为宇宙中央的须弥山和它四方的四大部洲,这样理解也并不为过。

四、室利沙和钱义的考证

室利沙,汉文文献中也称“实哩沙”、“实哩沙哩卜得啰”,是与真觉寺及金刚宝座塔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对金刚宝座塔兴建以及真觉寺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清凉山志》和《补续高僧传》中所记载,室利沙为东印土撈葛麻国王之子,年少时“聪敏不凡,而百无所欲。唯见佛法僧则深起敬信”,^{④①}遂于十六岁时出家为僧,出家后“资受学业,习通五明,阖国臣庶以师戒行精严,智慧明了,称为五明板的达”。^{④②}他曾于永乐十二年(1414)来华,“谒文皇帝于奉天殿,应对称旨……”^{④③}并于永乐十五年(1417)奉命游五台山。返京后,又在武英殿受到永乐帝的召见,“天语温慰,宠赉隆厚,授僧录阐教”;^{④④}永乐二十二年(1424),“仁宗昭皇帝举荐扬大典,师掌行,特授师号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弘教灌顶大善大国师。赐金印宝冠供具仪仗”。^{④⑤}洪熙元年(1425)“宣宗章皇帝举荐,亦命师掌行”。宣德元年(1426)正月十三日圆寂,“上闻,痛悼之。御祭火化,敕分舍利为二。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一塔于台山普宁基,建寺曰圆照”。^{④⑥}这是对室利沙一生事迹,尤其是游历于中土种种活动的详细记载。由此可知,室利沙在圆寂后其舍利曾被藏于真觉寺塔内。事实上不仅如此,通过一番追索,可以发现其生平的一些重大事迹与文献中记载的敬献五佛和金刚宝座塔样式的西番班迪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两则史料为证,一则是清代《日下旧闻考》中收录的姚夔碑记,另一则是明末《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真觉寺”记述。姚夔碑记载:“永乐中国师五明班迪达召见于武英殿,帝与之语悦之,为造寺。”^{④⑦}此碑至清初仍立于五塔寺内。《帝京景物略》中真觉寺一则也有载:“成祖文皇帝时,西番板的达来送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④⑧}综合两则史料,其中所记载的班迪达受永乐帝召见的“永乐中”时代、受封大国师以及特为其建真觉寺诸多关键因素均与《补续高僧传》中的室利沙相吻合。但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关于明代敕封的大国师的名号及数量,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均有

迹可查。据载,永乐时期封授的灌顶大国师共有九位^{④⑨},其中对大善大国师的记载“命西天刺麻板的达为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洪(弘)教灌顶大善大国师……各赐金印”,^{⑤⑩}与《续补高僧传》中对室利沙的记载大致相同,但与《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中其他八位大国师的记载略有出入,此处并没有提及大国师姓名,而是以“西天刺麻板的达”代称,其他八位均明确记录高僧名字,如“僧录司右善世智光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广泛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⑤⑪}“命妥巴阿摩葛有(为)灌顶圆通慈济火(大)国师……”,^{⑤⑫}在此可以理解为《明实录》中有意用“西天刺麻板的达”这一称号代指室利沙,而室利沙本人也的确因“习通五明”,“戒行精严,智慧明了”而被称为五明板的达,^{⑤⑬}《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中的“班迪达大国师”、姚夔碑“五明班迪达”、《帝京景物略》“西番板的达”等诸多文献的记载,也应是延续了此种说法。

由此将“大善大国师”视为“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的西域番僧,是合乎情理的。这位印度的佛教使者从永乐十二年(1414)来华,至宣德元年(1426)圆寂,其间一直生活在中国,前后共达十一年。从文献记载来看,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五台山两地,在京曾受度弟子数千,^{⑤⑭}影响颇深。据学者杜常顺考证,作为东印度僧人,室利沙还是明代“西天僧”中比较重要的一系,其后仍有法脉在真觉寺弘传。^{⑤⑮}这在金刚宝座塔台基的佛像供养人题记中还留有两处重要的铭证,表明了该塔与西天僧关系十分密切:一处题记为“西天经厂信^{⑤⑯}北九巨力施财造”,另一处题记前半部分已损毁,只能见到后半部分“塔室利施财造”的字样。西天经厂为明代内廷经厂之一,与印度的“西天僧”有直接关系,北九巨力、塔室利均为梵文名字的音译。

对室利沙的身份加以考证,一则有助于分析金刚宝座塔的

④①(明)释明河著《补续高僧传》,卷二五“大善国师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925年。

④②同上注。

④③同上注。

④④同上注。

④⑤同上注。又据《清凉山志》记载“封圆觉妙应辅国光范大善国师”。

④⑥(明)释镇澄原纂,释印光重修《清凉山志》卷二《伽蓝胜概》。

④⑦《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范围”,第1295—1296页。“真觉寺塔規制特奇,寺有姚夔碑记,永乐中国师五明班迪达召见于武英殿,帝与之语悦之,为造寺。”

④⑧《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第200—202页。

④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闾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它禅师、僧官不可悉数。”

⑤⑩《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一四二四·一〇·七),转引自《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页。

⑤⑪同上注。

⑤⑫《太宗实录》(梁本卷九一·页三下、馆本卷一四七·页三上),永乐十二年正月丙申(一四一四·二·一一),转引自《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6页。

⑤⑬《补续高僧传》,卷二五“大善国师传”。“板的达”称号来源于印度,意思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

⑤⑭《补续高僧传》卷二五“大善国师传”。

⑤⑮同注③。

造像风格,二则使金刚宝座塔的始建年代更加明确,由《补续高僧传》可知室利沙来华时间为永乐十二年(1414),相应塔的始建时间可进一步限定在这一时间之后,永乐二十二年(1424)之前。

如果将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比喻为一棵参天伟岸、枝叶繁茂的菩提树,室利沙可以称得上是将这一名贵树种由印度带入中国的传播者,甚至播种者,那么另一位人物——钱义,负责真觉寺及金刚宝座塔工程的具体承建者,则相当于为这棵菩提树修枝剪叶、精心培育的园艺师。

钱义,《明史》记载阙如,仅在卷三〇七《李孜省传》中有所提及,^{⑤⑥}但幸好五塔寺,也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存有一方他的墓志,为解析钱义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据载,钱义生于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二十七日(1435),卒于成化二十年(1484)七月二十日,正统二年(1437),选入禁廷,历任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宦官,官至御用监太监,因成化九年“奉敕建真觉寺”,^{⑤⑦}故卒后亦遂其夙愿被安葬于真觉寺内。^{⑤⑧}墓志不仅对其生卒和仕历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提及了钱义的喜好与优长,其中尤以两则值得注意:一为“凡古今奇异器物,名公书画,人所不识

者,一目悉知其详,且能品题其高下”,可见其对古玩鉴定颇为精专;一为“朝廷凡有制造,必经与工艺者商榷,然后称旨,其生而累荷,宠遇之厚,没而重承”,^{⑤⑨}这一方面反映其利用对工艺的精益求精达到邀宠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钱义本人对宫廷艺术活动的参与程度非常之深,某些程度上在承担着图样设计者、质量把关人的作用。这些对于考究真觉寺及金刚宝座塔的风格成因不无裨益。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是我国最早一座由皇家敕建的金刚宝座塔,造型上不仅直接承传了印度菩提伽耶塔的五塔形制,具有佛成道证悟的含义,同时又将密教金刚乘的五方佛思想贯穿其中,将两者紧密结合,构筑了严密的佛教宇宙世界。雕刻题材与形式更是融汇了汉、藏、印等多种艺术风格,集中体现了明代北京地区在对多种文化吸收、容纳上的强大优势。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作为佛教思想与佛教艺术完美结合之典范,带动了北京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1748)、北京西黄寺清净化城金刚宝座塔(1782)、内蒙古呼和浩特慈灯寺塔(1727—1737)等一系列金刚宝座塔的兴建,而垂范于后世!

^{⑤⑥}《明史·李孜省传》:“时宪宗好方术,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

^{⑤⑦}据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钱义墓志记载。另据《北游录》中有关真觉寺的记载:“成化癸巳太监钱义重修。”参见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清代笔记小说·北游录》第32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⑤⑧}参见钱义墓志:“尝语太监郭润、柯兴曰:‘身后务瘞我于斯,使体魄有依,尔等识之。’”

^{⑤⑨}参见钱义墓志。

第二节

北京西山大觉寺的
佛教造像艺术

一、大觉寺的历史沿革

大觉寺位于北京西北郊阳台山东麓,是中国北方一座久负盛名的千年古刹。这座寺院历来皆为禅宗道场,最早称为清水院,在辽代统和年间(983—1012)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了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就已有“幽都胜概”的美誉,可以想见当时寺院规模之盛。^①

在金代,大觉寺虽不见于史籍记载,但是根据明代末年纂修的《帝京景物略》所载,大觉寺在金代是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名称仍是清水院,并作为皇家寺院成为了皇帝礼佛游幸之所。^②在元代,大觉寺曾经一度更名为“灵泉佛寺”,而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大觉寺的相关记载。这想必是金元之际北京饱受战火摧残,大觉寺亦未能幸免,毁损较为严重之故。到了明朝建立并迁都北京以后,大觉寺因为皇家的再度重视而被数度重建、扩建和修缮,开始了大觉寺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

有明一代,大觉寺曾经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重修,现今大觉寺所存的主体殿堂、佛像和法器等均是在这三次营建工作之中形成的。

明宣德三年(1428)时,因为阳台山“岁久敝甚,而灵应屡彰”,所以侍母至孝的明宣宗出于“宗庙享其福,国家保其祚,幽显蒙其济,天佑圣母”的宏愿,奉其母孝昭太后之命,出内府帑银重新修造了大觉寺的前身灵泉禅寺,并正式发布敕谕改其名为大觉寺,将其赐予明初著名的“西域僧”领袖智光和尚作为晚年的养老之地。由于灵泉禅寺已经残破不堪,凋敝已甚,所以宣德皇帝这次大规模兴工是“撤而新之”,几乎完全拆除了以前旧有的木构建筑,并在原基址上重新修盖佛堂殿宇。同时,这次敕修还重新塑造了各殿内的佛教造像。落成之后,“殿堂门庑岿焉奂焉,像设俨然,世尊在中,三宝以序,诸天参列,鹿苑鹫山如睹”,梵宇宝刹鼎革一新,可谓庄严殊胜,冠绝当时。^③这次的重修基本上奠定了大觉寺现在的格局。

沉溺于藏传佛教的英宗皇帝在即位以后经常巡幸阳台山,对这里青山秀水之间古寺幽然的景致颇为喜爱,而且这里位于京城到明帝陵的大道旁,每当英宗前往帝陵谒祭先帝时都必路过此地登临大觉寺。正统十一年(1446),明英宗朝佛之余见大觉寺“顾岁颇久,颓弊日增”,一派年久凋敝之状,因而感念其父皇在天之灵,敕命工部右侍郎王佑督工对大觉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在这次的工程中,“命易其故廓其隘,凡诸像设与夫供佛之具、居僧之舍,亦皆新而大之”,展扩了原先大觉寺的院墙,增修了僧舍等建筑,并将寺内所供佛像和供佛所用的法器等均进行了修理、改造和更新。可以说,这次工程是大觉寺继宣德年间重建以来一次较大的改动,现在各殿宇中所供的佛像都与这次修缮有密切的关系,下文将对其作详细讨论。^④

①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北京 2588 号,咸雍四年(1068)《大辽阳台山清水院造藏经记》:“……阳台山者,薊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跨燕都而独颖,侔东林而秀出。……”原碑文字多已漫漶,现存大觉寺内。

②参见(明)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五“黑龙潭”条所载:“西城外又北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建。寺故名灵泉佛寺,宣宗赐今名,数临幸焉,而今圯。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清水者,今绕圯阁出,一道流泉是。”

③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北京 2582 号,明宣德三年(1428)四月七日《御制大觉寺碑》:“……北京阳台山,故有灵泉禅寺,岁久敝甚,而灵应屡彰,兼承慈旨,撤而新之,木石一切之费,悉自内帑,不烦外朝,工匠杂用之人,计日给佣,不以役下。落成之日,殿堂门庑岿焉奂焉,像设俨然,世尊在中,三宝以序,诸天参列,鹿苑鹫山如睹,西土万众仰瞻,欢喜赞叹,遂名曰大觉寺。惟圣母茂勋功德盖以集隆福于宗庙,中以延鸿祚于国家,下以普慈济于幽显,至仁之施愈远且大。夫宗庙享其福,国家保其祚,幽显蒙其济,天佑圣母……”

④关于这次工程的缘起和状况,现存寺内的《御制重修大觉寺之碑》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今虽鉴取上宾,然尤日切朕念,每诣山陵谒祭延望伊迓,能不益兴追慕之思,间自中道,躬谒寺下,徘徊久之,顾岁颇久,无以副圣慈在天之灵,乃命易其故廓其隘,凡诸像设与夫供佛之具、居僧之舍,亦皆新而大之。”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北京 2580 号,明正统十一年(1446)十一月一日《御制重修大觉寺之碑》。

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大觉寺又一次因为明宪宗之母周太后出于“追思曾祖妣之仁,又世居其山之麓”的缘故而得到赞助进行重修。这次修缮工程主要集中在“殿宇、廊庑、楼阁、僧舍、山门”等木构建筑方面,而且在修竣以后,周太后将自己的弟弟周吉祥任命为僧录司右阐教兼大觉寺住持,全面管理大觉寺的事务。有意思的是,这次修缮的发起人宪宗之母周太后的家乡就是在大觉寺附近的周家巷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周太后自己出资拨内府帑银修葺大觉寺,其用意就是以这种方式将这座久负盛名的皇家寺院作为自己的家庙。^⑤

自从成化年间的这次修缮结束后,终明一代,大觉寺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重修。到了清代,大觉寺依然受到了皇家的大力扶持,在清代早中期可谓繁盛一时。有清一代,大觉寺曾经经历过两次大的维修。

第一次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当时还是雍亲王的皇四子胤禛出资重修。胤禛自年幼时即喜爱研读佛教典籍,受到过很好的佛学教育。年长以后,胤禛更是崇信佛教,与当时多位著名的高僧都有过密切交往,而且尤其对禅宗情有独钟,经常与禅宗僧人静修参禅、讲经论道。其中有一位胤禛颇为欣赏并十分倚重的高僧,名为迦陵性音和尚。和尚为禅宗的五大流派之一的临济宗僧人,品行高洁、深悟禅机,与胤禛相交多年,机缘深契。因此胤禛决定出资修缮北京西山“山深静幽,泉石殊胜”的大觉寺,以为迦陵性音和尚的静修之处。但是关于这次修缮的具体细节,因为文献叙述过于简略,现已无从得知了。

第二次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的时候。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开始经营西山,在这一带修葺并兴建了很多人文景观,大觉寺作为京西名刹自然也在修缮之列。这次修缮主要由于“圣迹攸昭,而积岁兹久,丹雘脱落”,因此“爰加修缮”,对脱落油彩之处加以补饰,而其余部分应当没有做大的改动。^⑥此次修缮以后,大觉寺一直作为皇家寺院而得到重视,寺内建有行宫院落,各殿均有豪华的皇家陈设,以备皇帝不时临幸悠游。^⑦

然而清代中期以后,国力日渐衰微,大觉寺虽然依靠康乾盛世时皇家的封赐积累了丰厚的寺产,尚能经营维持,但已渐至没

落,逐渐失去了皇家寺院的地位。^⑧到了清廷覆灭民国肇建的时候,大觉寺由于年久失修已显得破败不堪了,只是因为这里青山绿水、苍松翠柏的自然环境以及古寺悠悠的人文景观,颇受来往游人的喜爱,大觉寺俨然成为了躲避城市喧嚣的游览胜地。建国以后,大觉寺已有上百年没有进行过维修,破败已甚,满目疮痍。此时的大觉寺停止了宗教活动,寺院划归国家林业部门,又一度由北京林学院管理和使用。在此期间,林学院颇为重视保存古迹,曾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寺院进行整修。幸运的是在“文革”期间,寺院主体完整地保存下来,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并保持了原状。1979年,大觉寺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使大觉寺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1988年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林学院正式达成移交协议。到1991年,大觉寺正式移交北京市文物局,建立了文物管理处,自此以后的数年里,大觉寺在修旧如旧的原则基础上得到了大规模的修整,复建了历史上因为多种原因毁损的建筑物,并同时整理了寺内所存文物,整治了寺内和周边环境。自此,大觉寺这座延续千年的古老名刹终于获得了新生。^⑨

二、大觉寺现存的明代建筑及造像概况

现存大觉寺的主体建筑排列在东西向的一根轴线上,依次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和大悲堂等建筑。其中明代原构殿堂有三座,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无量寿佛殿。这三座明代殿堂均始建于大觉寺在明代第一次重建的时候,即明宣德三年(1428)。虽然在明清两代大觉寺经历过多次维修,但这三座殿堂的木结构部分以及殿内装修和部分佛教造像仍相对完好地保持了宣德和正统两朝经营大觉寺时的风貌。

此外,在钟楼内还完好地保存着一口宣德五年(1430)七月由智光领衔发心铸造的铜钟,遍身铸满梵汉字经文,在四方还雕铸有四大天王形象。在大钟腰部位置铸刻有发愿人和经办人的姓名法号,颇为重要:

^⑤在寺内也存有《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录了这次修缮的缘起:“……后又三十二年为成化戊戌,我圣母皇太后追思曾祖妣之仁,又世居其山之麓乃矢心重造,特出官内所贮金帛,市材僦工,凡殿宇、廊庑、楼阁、僧舍、山门,靡不毕具。实矣实轮,浮于前规,寺额仍旧。……”参见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北京2592号,明成化十四年(1478)九月一日《御制重修大觉寺碑》。

^⑥见《御制重修大觉寺碑》一通。

^⑦见寺内所藏嘉庆二十三年的一件契约文书,内容是将大觉寺内行宫的陈设全部撤回,运交黑龙潭新建的卷殿内安置,其余残缺不全的都交于圆明园器皿库收存。

^⑧同上注。

^⑨参见孙荣芬、张蕴芬、宣立品等著《大觉禅寺》,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73—81页。